

# 日本构建“民族文明秩序”的逻辑冲突与矛盾心态

## ——以近代博览会上的阿伊努人种展示为例\*

周 菲 菲

**内容提要** 近代世界博览会上的人种展示曾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理论依据,甄选、分类与展示被标签化为“野蛮”“原始”民族的身体与文化,以此将“文明”与白色人种的优越性挂钩。而明治维新后致力于“文明开化”的日本效尤西方这一“人类动物园”式的展示方法,通过在世界博览会上展示生理特征接近于白种人的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人,试图彰显作为黄种人的“和人”的优越性及其文明化的成果。随着这一意欲跻身“人种等级”顶端的展示方式受到西方的排斥,日本逐渐将阿伊努的展示舞台转向国内,并将其与当时的其他殖民地原住民并置,为日本在亚洲实施的“民族同化”政策正名。这种策略的转换凸显了近代日本企图构建一个“日本民族”作为东亚盟主、与白种人平等对话的话语体系,从而跃迁以欧美为中心的人种政治乃至文明秩序。

**关键词** 阿伊努 近代日本 博览会 文明 人种

### 引 言

对于近代日本而言,“人种”问题是阻碍其所试图融入的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主要藩篱之一。正如张小龙所述,欧美民族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并固化了审美逻辑与社会心理之间的互动模式,强调肤色深浅与社会身份高低的内在联系<sup>①</sup>。日本近代著名学者井上哲次郎曾引用斯宾塞的《首要原理》(*First Principle*),指出“日本人无论在智识、财富、体格乃至其他百般事上,大多劣于西洋人”,并频繁引用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对南洋“劣等人种”灭绝过程的描述,以此警示日本人应当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sup>②</sup>

正如明治八年(1875年)出版的大众启蒙书籍《明治之光》所主张的:“日本属于黄种……文明现于此世,若夫西方大国之魁首为英吉利,但盼能见东方(之魁首)为名副其实之‘日本’”,<sup>③</sup>为了去除“劣等”人种的标签、取代中国在东方的优势地位,以便成为与英国并驾齐驱的“东方魁首”,日本不仅努力摆脱了殖民化的危机,还掀起了对外扩张的浪潮。其中规模最大的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推动了日本跻身于列强行列,即成为所谓“一等国”。即便如此,肤色象征的人种鸿沟仍然无法填补。真嶋亚有指出,分割西方与日本的“人种”的棘手问题是令近代日本人忧郁到难以直视

\* 本文为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22PJC00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张小龙:《“阿伊努印象”与近代西方视野中的日本人种族身份认知》,载《世界民族》,2016年第2期。

② [日]井上哲次郎:《内地雑居論》,哲学书院,1889年,第1—55页。

③ [日]広田卓次録等:《明治の光:一名南橋散士夜話 卷1》,光風社,1875年,第1—2,8—9页。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添加。

的“命运”；<sup>①</sup>近代日本与西方之间存在一条人种界线，这既是日本与西洋的人种异质性，也是日本与东洋的人种同质性。<sup>②</sup>

1904 年 4 月，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全称为路易斯安娜购地纪念世界博览会，Louisiana Purchase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隆重开幕。时值日俄战争，俄国退出了参展。然而，日本则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花费 80 万日元巨资，接手了原本为俄国预留的展区，并及时准备了 24 个主题展览。可以说，日本试图利用该次博览会的舞台，展示其国力，并以此炫示其作为“优等”的“黄种人”的胜利。

然而这其中看似矛盾的是，尽管日本自诩为“文明”“一等”国家，却同意把其国民作为土著部落人展示于世界舞台。“人类学馆”展示了九名阿伊努人（其中包括四名男性、三名女性和两名女童）。另外，人类学馆还展示了两座阿伊努人传统居住建筑 cise 及阿伊努生活与仪礼所需物资。这些展品是由芝加哥大学人类学部教授弗里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Starr）在传教士巴彻勒的协助下带到圣路易斯会场，并在人类学馆展出的。

宋念申认为，这是一种“人种政治象征，即以当时的体质人类学<sup>③</sup>观点，阿伊努人高鼻深目、接近于高加索‘白种’人，却在与大和民族的长期争斗中不及‘黄种’的大和族‘进化’‘文明’”<sup>④</sup>。张小龙则指出，近代欧美人对于肤色与身份的认知模式“一旦应用于对阿伊努人的身体观照，就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被视为高贵阶层专属的‘白中透红的肤色’特征同样出现在社会底层的阿伊努人身上”<sup>⑤</sup>。日本派出阿伊努人参展自然有其政治目的，但展出所起到的外宣作用却并不尽如其所愿。在长达八个月的博物馆展览期间，阿伊努人给美国观众留下了深切的感动，被视为“高贵的祖先”<sup>⑥</sup>。甚至有欧洲的自然人类学者认为阿伊努人与欧洲民族有着共同的起源，这意味着“对于日本人（对阿伊努人）的殖民压迫应给予严厉而明确的批判”<sup>⑦</sup>。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是对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还是七年后的日英博览会，包括人类学者在内，当时的日本人关于阿伊努人的记述都没有提及其白皮肤或与高加索人种的亲缘性。<sup>⑧</sup>

在近代盛行的博览会上，对人类的展示体现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到了全盛期。<sup>⑨</sup>首次展示人类自身的世界博览会可以追溯到 1889 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该博览会会场通过展示以埃菲尔铁塔等象征的“文明”统治以土著部落象征的“野蛮”的构图<sup>⑩</sup>，试图可视化地证明人类必然以欧美为顶点而“进化”的论断。

在 20 世纪初，阿伊努人曾两次被展示在世界博览会上。美国人类学者凡斯通总结了 1904 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美国主办方与协助方的人类学者们为展现“进化顺序”所做的工作。<sup>⑪</sup>吉见

① [日]真嶋亚有著，宋晓煜译：《“肤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4 页。

② [日]真嶋亚有著，宋晓煜译：《“肤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81 页。

③ 即欧美的体质人类学。

④ 宋念申：《发现东亚》，新星出版社，2018 年，第 231 页。

⑤ 张小龙：《“阿伊努印象”与近代西方视野中的日本人种族身份认知》，载《世界民族》，2016 年第 2 期。

⑥ [日]宫武公夫：《海を渡ったアイヌ 先住民展示と二つの博覧会》，岩波書店，2010 年，第 74 页。

⑦ [奥]クライナー・ヨーゼフ：《ヨーロッパ人の抱いたアイヌ観と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アイヌ研究》，载文部省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学術調査）研究報告書：《欧米アイヌ・コレクションの比較研究》1994—1996 年度，1997 年，第 16—19 页。

⑧ [日]宫武公夫：《海を渡ったアイヌ 先住民展示と二つの博覧会》，岩波書店，2010 年，第 71 页。

⑨ [日]宫武公夫：《海を渡ったアイヌ 先住民展示と二つの博覧会》，岩波書店，2010 年，第 7 页。

⑩ [日]吉見俊哉：《博覧会の政治学—まなざしの近代》，講談社，2010 年，第 189—194 页。

⑪ James W. , “Vanstone The Ainu Group at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1904”, *Arctic Anthropology*, vol. 30, no. 2, 1993, pp. 77-91.

俊哉指出,日本在劝业博览会和日英博览会上引入了西方的“人类动物园”<sup>①</sup>的陈设视角与方法<sup>②</sup>。松田京子则在《帝国的视线》中指出,1903年大阪博览会上的阿伊努人等族群的展示体现了投射向他者的目光所包含的权力性。<sup>③</sup> 宫武公夫在研究中整理了当时的报告书、纪录、新闻杂志报道,并发掘了相关照片、雕刻、工艺品等非文字资料,还对参加者本人及其后代进行了访谈,剖析了阿伊努人如何在两次世界博览会上在被束缚的同时积极构建自身的主体性。<sup>④</sup>

从近代日本的帝国政治秩序的角度来看,以“虾夷”为代表的由传统华夷秩序转化而来的歧视观念,演变为基于文明化逻辑而产生的对“旧土人”的歧视观。<sup>⑤</sup> 随着日本殖民地的扩大,中国台湾、朝鲜半岛乃至东南亚等的原住民也被日本人称作“土人”“蕃人”等。因而,阿伊努人与近代日本的殖民问题密不可分。博览会上的阿伊努人展示一般被批判为具有殖民主义性质,因其目的是正当化以西方社会为顶点的等级系统。<sup>⑥</sup> 李正亮从日本人类学者坪井正五郎提出的“民族混合论”这一进化论角度,分析了1903年在大阪举行的国内博览会“学术人类馆”事件所反映的帝国殖民权力结构。<sup>⑦</sup> 也有研究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出发,将日本安排的阿伊努、中国台湾、“满洲”乃至朝鲜半岛的展示看作是显示近代日本“进步”“近代化”“文明化”的工具。<sup>⑧</sup> 张曦指出,日本近代国家对北海道及冲绳的管理带有国内殖民主义色彩。<sup>⑨</sup>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帝国”相关研究中的主流观点认为,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大约在同一时期形成,并以相互补充的方式存在。<sup>⑩</sup> 山室信一提出的“国民帝国论”认为,日本建立殖民地与英法等欧洲国家远赴他乡寻求资源的做法不同,其特征是“从本国近程逐渐向外部扩张,呈同心圆状”。<sup>⑪</sup> 无独有偶,丸山真男也指出,“如果以天皇为中心划一个同心圆的话,在其周围每一等距离上便会呈现一幅万民翊赞的景象。但这个中心不是一个点,而应该是一条垂直贯穿的纵轴。由中心无止境地向外辐射的价值取向,正是由这一纵轴的无限性(天壤无穷的皇运)来保障的”<sup>⑫</sup>。

如果以“同心圆”理论的视角来看,在时间上,阿伊努人作为最早被“文明化”之“夷”,在日本帝国主义兴起之时就被纳入了民族国家体系;就空间而言,北海道作为距离天皇最近的国内殖民地,在地理位置上位于日本列岛向外扩张的边境,因而自然而然地成了象征日本“皇威武德”永续与扩张的标志和典范。在博览会的舞台上,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构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时间轴的新的理论依据,被用来展示日本“绝对价值”的不断扩大的状态。

① 人类动物园(Human zoo),又称“民族学博览会”“人类的展示”,日文作“人間動物園”。一般指19世纪至20世纪时,殖民者/侵略者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种歧视、进化主义、殖民主义,公开把被视为野蛮、未开化的人类进行系统性展示的行为。被展出的人们通常被置于所谓“自然”或“原始”状态。展示的目的通常在于强调西方社会的优越性、普遍性,隐含劣势民族向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性,由此正当化殖民行为。

② [日]吉見俊哉:《博覧会の政治学—まなざしの近代》,講談社,2010年,第189—194页。

③ [日]松田京子:《帝国の視線—博覧会と異文化表象》,吉川弘文館,2003年,第1页。

④ [日]宫武公夫:《海を渡ったアイヌ 先住民展示と二つの博覧会》,岩波書店,2010年。

⑤ [日]今西一:《帝国日本と国内植民地》,载《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2007年9月第19卷1号,第21页。

⑥ [日]宫武公夫:《博覧会の記憶: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博覧会とアイヌ》,载《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紀要》,2006年2月第118号,第46页。

⑦ 李正亮:《帝国、殖民與展示:以1903年日本勸業博覧會“學術人類館事件”為例》,载《博物館學季刊》,2006年第2期。

⑧ Street Brian, “Representing the other: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 in Edwards Elizabeth (ed.),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1860—192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23.

⑨ 张曦:《日本的边境论——北海道、冲绳的边境性》,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5期。

⑩ [日]山室信一:《「国民帝国論」の射程》,载[日]山本有造編:《帝国の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8年,第88页。“Nation state”即中文“民族国家”,日文一般译作“国民国家”。

⑪ [日]朝日新聞取材班:《過去の克服と愛国心》,朝日新聞社,2007年,第82页。

⑫ [日]丸山真男著,陈力卫译:《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0页。

对于阿伊努人种展示问题,既往研究大多聚焦于一次或两次特定的博览会,分析了其中涉及的殖民主义与身份政治等问题。然而,从1903年的大阪国内博览会到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再到1910年的日英博览会,以及之后在日本国内举办的拓殖博览会,阿伊努人种展示从日本对外宣扬“文明开化”成果与殖民正当性的外交工具,及通过展现“野蛮”“原始”而敛财的工具,逐渐演变为在日本帝国内部为殖民地“民族同化”政策正名的统治手段。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明治初期至大正时期涉及阿伊努人种展示的相关史料,其中包括日本、美国、中国的博览会事务局报告书、新闻报道等,深入考察几次主要的阿伊努人种展示的动机、特点、舆论反响、演变方向及其影响。通过以上分析,管窥近代日本如何试图补充白种人中心的种族地图的知识体系,最终又是怎样选择了“民族同化”作为殖民政策与宣传手段,以应对其在文明等级体系中产生的人种焦虑和殖民野心交织而成的矛盾。

## 一、“人种展示”以前的阿伊努人

北海道古称“虾夷地”,其原住民阿伊努人逐渐形成一个民族、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大约在日本中世<sup>①</sup>,被日本本州的“和人”<sup>②</sup>称作虾夷、夷人或土人。此时和人开始进入北海道南部,与阿伊努人进行交易。15世纪后半叶,随着和人活动范围不断向虾夷地扩展,与阿伊努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其后,蛎崎家族<sup>③</sup>平定了争斗,成为虾夷地最有影响力的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和人与阿伊努人之间的交易及雇佣关系。16世纪末,俄国开始向东南方向扩张,俄罗斯人与阿伊努人在虾夷地北部的四个岛屿上杂居。17世纪初,德川幕府政权在松前岛(夷岛)设立松前藩,将和人与阿伊努人的居住地分开,并垄断了与阿伊努人的交易权。1669年,阿伊努人发起了对松前藩的反抗,但最终失败。<sup>④</sup>到了1792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派遣使节拉克斯曼乘军舰到达了虾夷地根室,并向德川幕府递交了要求通商的国书。幕府拒绝了这项请求,并因此提高了对俄国的警惕。

江户末期,虾夷地在国外压力的推动下开始逐步被幕府直辖。尤其是到了19世纪,频繁出现的西方船只引发了日本“攘夷”风潮的高涨。在将外国人蔑称为“夷人”的同时,为了令阿伊努人归顺,幕府从安政三年(1856年)开始,在公文书中将阿伊努人改称为“土人”,以此把阿伊努人“国内民”化<sup>⑤</sup>。当时,阿伊努人受到两项政策的压迫,一是经济上的松前藩“场所承包制度”<sup>⑥</sup>,即把交易的“商场”承包给商人进行渔业管理与贸易,强制阿伊努人成为劳动力,限制其流动和婚姻;二是文化上的德川幕府的“抚育同化政策”,旨在令阿伊努人在风俗习惯甚至姓名上和化<sup>⑦</sup>。两项政策的目标都是试图在开发虾夷地的同时,将之打造为防御俄国南下的重要前线。幕府也认识到和人施行的苛政使得阿伊努人往往与俄国人关系更为亲厚,<sup>⑧</sup>还特别发布通告恐吓“皈依邪宗门者、亲近

① 中世一词在日本指封建社会初期,而近世则指封建社会晚期。日本学界通常认为,中世是指1185—1600年。

② 和人即日本主体民族,又称大和族、和族、倭人。江户末期,以俄罗斯南下为背景,为了让阿伊努人产生“和人意识”“和人”用以指代“维持幕藩体制的人”;近代以降,“和人”这一表达主要作为历史用语在北海道内使用,七七事变以后的战时则被改称为“大和民族”(引自小笠原信之:《アイヌ差別問題読本》,緑風出版,1997年,第266页)。

③ 日文作“蠣崎氏”,指曾在中世居于虾夷地(现北海道渡岛半岛)的和人豪族,1599年改称松前氏,是整个江户时代虾夷地唯一的大名。

④ 以上记载主要依据〔日〕北海道环境生活部文化局文化振兴课:《北の生活文化(中世から近世のアイヌの人々)》, [https://www.pref.hokkaido.lg.jp/ks/bns/digest/1\\_syou.html](https://www.pref.hokkaido.lg.jp/ks/bns/digest/1_syou.html)。

⑤ 〔日〕今西一:《帝国日本と国内植民地》,载《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2007年9月第19卷1号,第21页。

⑥ 日文作:“場所請負制度”。

⑦ “和化”即“和人化”,亦称“和風化”,而姓名上的和化也称“和名化”。

⑧ 《蝦夷地之義》,载《伊藤博文関係文書(その一)拓務関係書類》,1870年。

外国人者,其罪必重”<sup>①</sup>。

1869年7月,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在虾夷地设置“开拓使”。8月,虾夷地更名“北海道”。这标志着“虾夷地”从异民族居住的“外地”转变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并接受直接统治。如1870年《北海道之议》中所述,北海道是“北境接鲁国(俄国)之要冲之地”,须标明地界、兴农业以“强国本”。<sup>②</sup>在与俄国紧张的领土关系的持续过程中,日本政府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名义推进“开拓使”政策,并采用支付餐旅费等措施支持移民,以此巩固北海道的防御,为进一步开发北海道、拓展疆土做了准备。1886年,明治政府设立北海道厅,开始了北海道的殖民地选定事业及本州资本对北海道的投资事业。自此,北海道的本州移民激增。从明治二年(1869年)到昭和十一年(1936年),从本州移居到北海道的日本人总数约为300万人。而在德川幕府末期,虾夷地的和人仅有6万人。<sup>③</sup>

明治政府不断强化对于阿伊努人的同化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是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制定的《北海道旧土人法》。该法律对阿伊努人原有的狩猎、捕鱼营生进行了限制,令其改务农业,并且通过学校教育令阿伊努人和化。这些措施导致许多阿伊努人被迫放弃了其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处境日趋困窘。到了1901年,《旧土人儿童教育规定》颁布,阿伊努儿童的就学率和课堂出席率从19世纪末期的30%左右攀升到了1910年代的90%。<sup>④</sup>

在明治五年(1872年)3月至4月间,文部省博物局在汤岛圣堂举办了一场展览,狩猎的阿伊努人作为棕熊饲养员参与其中。在1873年5月1日至11月2日的维也纳博览会上,阿伊努民族被作为北海道物产进行展示。对于初期的明治政府而言,阿伊努人只是与日本边疆安全相关的一个话题,其人种特征并未得到正视。因而,阿伊努人并未作为主角登上当时的博览会舞台,而是被看成了帝国殖产兴业资源的一部分;观众们大多是抱着猎奇的目光看待阿伊努人的。

## 二、可视化的殖民野心——1903年大阪国内劝业博览会人类学馆的阿伊努人种展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张謇自费<sup>⑤</sup>赴日本参观访问大阪博览会,即日本第五届国内劝业博览会。会期为1903年3月1日至7月31日,吸引了530万余名观众。设有工业馆、美术馆、教育馆、农业馆、林业馆、机械馆、水产馆、动物馆、通运馆、参考馆、中国台湾馆等展馆和相关设施;主会场外还有人类馆、不思议馆、世界一周馆、参考馆等,实际上被打造为一个小型世博会,有14个国家、18个地区参加。博览会开幕当日,内藤湖南发表论说文章《博览会开会与总选举》称,这次博览会是“日清战争后,日本地位得到世界认可成为世界强国后的首次博览会……虽名为国内劝业,实则距离万国博览会只有咫尺”<sup>⑥</sup>;并强调,“这次的大博览会代表着膨胀期的新日本,可向国内外证明其进步的真实形迹”<sup>⑦</sup>。

张謇指出,在博览会通运馆的陈设中,当时已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理模型“极精审,可异者”,并且竟然同时绘入了福建诸海口,两者被标上了同样的黄色;对此,他表达了对日本侵华野心

① [日]高倉新一郎:《アイヌ政策史》,日本評論社,1942年,第145页。

② 《北海道之義》,载《伊藤博文關係文書(その一)拓務關係書類》,1870年。

③ 此段史实表述主要依据[日]北海道環境生活部文化局文化振興課:《北の生活文化(中世から近世のアイヌの人々)》,https://www.pref.hokkaido.lg.jp/ks/bns/digest/1\_syuu.html。

④ [日]小川正人:《「北海道旧土人保護法」・「旧土人兒童教育規程」下のアイヌ学校》,载《北海道大學教育學部紀要》,1992年第6期,第201页。

⑤ 当时张謇没有官职,以商人身份自费赴日考察。

⑥ [日]内藤湖南:《博覽會開會と總選舉》,载神田喜一郎、内藤乾吉编:《内藤湖南全集 第四卷「大阪毎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所載論說》,筑摩書房,1971年,第224页。

⑦ 《大阪で第五回国内勸業博覽會開く》,《大阪毎日新聞》,1903年3月1日。

的警惕,怒斥道:“振贝子<sup>①</sup>、那侍郎<sup>②</sup>或未见之耶!”<sup>③</sup>随后发生了“台湾馆”事件,即将福建展品置于台湾馆,馆中陈设缠小脚和抽鸦片的陋俗,此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和爱国士绅的强烈抗议,最终而被迫移出展馆并取消展示<sup>④</sup>,这一事件又称“博览会中国侮辱事件”。浙江留学生所编刊物《浙江潮》提到了台湾馆,称其为“吾中国人所最伤心之台湾馆”<sup>⑤</sup>。

19世纪末,正值日本采取殖民主义,走上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之时。1895年,日本打败了清政府,并与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从而获得了其第一个真正的殖民地,即中国的台湾。此后,日本参与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八国联军,缔结了日英同盟,并开始在福建扩大势力,企图进一步南下扩张。同时,日本还在持续侵略朝鲜半岛,逐渐与西方大国平起平坐。在这一背景下,日本首次在博览会上设置了台湾馆。

菅野正认为,“对于清国人、韩国人、琉球人、阿伊努人的蔑视观是人类馆的伏流,殖民主义观念则在台湾馆,福建与台湾均属日本领地的观念在通运馆,这些意识通过实际的展示物表现出来了,可比喻为不经意间从衣服底下漏出的铠甲”<sup>⑥</sup>。

大阪博览会中的“人类馆”,并不在博览会的主场馆,而在大阪博览会正门前,由民间人西田正俊经营,东京大学教授坪井正五郎<sup>⑦</sup>任顾问,制作并展示了一张世界种族地图。<sup>⑧</sup>坪井正五郎是参观前述巴黎世博会的日本学者之一,曾在日本《东京人类学会杂志》上连载介绍了巴黎世博会,并关注到了其中“野蛮未开化人种群居的村落”<sup>⑨</sup>中的人种展示的情形。“人类馆”将“清国人”与阿伊努人、中国台湾生蕃、琉球、朝鲜、印度、爪哇原住民并置,令观者观览其生活状态。1903年3月1日的《大阪朝日新闻》“博览会附录:外部娱乐”报道:“人类馆位于正门前对面”“宗旨为聚集与内地<sup>⑩</sup>相似的异人种,展示其风俗、器具、生活状态,含北海道阿伊努人五人,‘台湾’生蕃四人,琉球二人,朝鲜二人,支那人三人,印度三人,爪哇一人,孟加拉人一人,共计二十一名男女欢聚于模仿其各自国家住所之区划内,展示其日常起居动作。同时,会场内另设类似舞台之处,交替演奏本国歌舞乐曲,因此观众从正门入场,出口设于后门。门票是普通票十钱、特等票三十钱,特等票包含土人照片和雅座薄茶。”<sup>⑪</sup>

这间人类学馆与通运馆一样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博览会正式开幕之前发生了一起“人类馆陈列事件”。《革命逸史》记载,“该馆内置一二中国人表演我国腐败旧俗,以代表我国民全体。而与各地野蛮人种并列,亦为留学生所见,群起提出抗议。驻神户领事蔡勋因此亲赴大阪向当地官吏交涉,要求取消此种侮辱国体之陈列。日人初亦互相推诿,久未解决。留学生会馆乃公函致贝子载振及预备派往观会各官商,谓日人以无理辱我,止其勿来。日本政府闻之,惧因此伤害两国感情,卒令

① 即载振。

② 即那桐。

③ 张謇全集编委会编:《柳西草堂日记》,载《张謇全集》(第八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546页。

④ 冯自由:《大阪博览会侮辱中国事件》,载《革命逸史》初集,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89—190页。

⑤ 《日本第五卷 内国勸業博覧会観覧記》,载《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17日。

⑥ [日]菅野正:《大阪博覧会(一九〇三年)と中国》,载《奈良史学》,1995年12月13号,第142页。

⑦ 坪井正五郎(1863—1913年),日本人类学学者,在1889年、1892年被派遣至英法两国,归国后在帝国大学理科大学(今东京大学理学部)人类学教室任教授。

⑧ [日]金城勇:《學術人類館事件と沖繩一差別と同化の歴史》,载演劇「人類館」上演を実現させたい会编:《人類館一封印された扉》,アットワークス,2005年,第43—44页。

⑨ 坪井正五郎:《バリ一通信》,载《東京人類学会雑誌》,1889年9月第4卷第43号,第524页。

⑩ “内地”(ないち)一词指日本本土地,本身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称包括北海道在内的殖民地为“外地”(かいち)。至今,北海道仍有将日本本州地区称作“内地”的说法。

⑪ 《博覧会附録 場外余興》,载《大阪朝日新聞》,1903年3月1日。在1903年出版的《風俗画報》269号内也有内容基本相同的报道,只是人数记录为32名。

大阪府撤去之”<sup>①</sup>。此前上海《中外日报》刊文称人类馆设于大阪博览会会场内,日本外务大臣要求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与《中外日报》联系,要求订正该信息,他强调:“人类馆原本与博览会毫无关系,乃是由不慎重的演出商家单纯出自营利目的而设立的。”<sup>②</sup>而撤销陈列的信息则以日本驻沪总领事去函的名义登载于3月19日的《中外日报》,其中称:“此事原与博览会无涉,且此馆系丧心图利之市俗所设。”<sup>③</sup>

其后,人类馆更名为学术人类馆,坪井进一步准备了一些学术性资料,同时还举办了人类学演讲,意图通过这些措施“增添学术光彩,足以消除些许非难”<sup>④</sup>。虽然明治政府试图撇清人类馆与博览会的关系,人类学者坪井又将其冠上“学术”之名,但事实上,大阪府发行的“第五届国内劝业博览会”图版中也印刷了人类馆的形象<sup>⑤</sup>,并且该馆还得到了多个杂志和报纸部门的报道<sup>⑥</sup>。应该说,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敏感地捕捉到了日本试图通过展示与大和民族“相似的异人种”之序列,来证明其扩张与殖民统治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展现了其成为亚洲霸主的野心。

人类学馆也招致了朝鲜人、琉球人、阿伊努人的愤怒。根据《琉球新报》的报道,“两名琉球妇人被当作‘与下等动物相同的稀罕物,此事侮辱了县下四十万同胞’”<sup>⑦</sup>。还有阿伊努人发表演讲,主张:“人类并没有因人种而存在阶级、等级差别的道理。”<sup>⑧</sup>“学术人类馆”这一称呼象征着以“科学”为名,以“进化”为据,来对人类自身进行分类,从而操作人种的知识体系,即将“我们=进步”与“他者=落后”进行界定。然而实际上,该场馆也是盈利场所,因而也可谓是“学术”殖民展示的消费空间。

图1 1903年日本第五届国内劝业博览会入场券之人类馆优待券



### 三、“眼目之教”背后的人种竞争: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的阿伊努人种展示

1873年,明治新政府应奥地利邀请派遣使节团参加维也纳博览会。该使节团曾将博物馆的主旨归纳为“眼目之教”,即最为直观、便捷地开启人智、增进工艺。<sup>⑨</sup>在大阪国内博览会翌年举行的

① 冯自由:《大阪博览会侮辱中国事件》,载《革命逸史》初集,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90页。

② 《大阪二措ケル人類館二関する中外日報ノ記事正誤ヲ訓示 小村寿太郎外務大臣より小田切総領事宛》,载《外務省文書第四册》,1903年3月19日。

③ 《小田切万寿之助総領事より小村寿太郎外務大臣事宛》,载《外務省文書第四册》,1903年3月30日。此文附有报纸上所登载的声明。

④ 《學術人類館》,载《実業世界・太平洋臨時増刊(三十六年博覧会)》,1903年4月第1卷第5号,第174页。

⑤ 《第5回国内勸業博覧会-図版-16》,乃村工藝社グループ[https://www.nomurakougei.co.jp/expo/material/list?type=2&sort=1&e\\_code=1409&return\\_url=https%3A//www.google.com/&p=2](https://www.nomurakougei.co.jp/expo/material/list?type=2&sort=1&e_code=1409&return_url=https%3A//www.google.com/&p=2)。

⑥ [日]北岡正子:《第五回国内勸業博覧会と清国留学生》,関西大学文学部中国語中国文学科編:《文化事象としての中国》,関西大学出版部,2002年,第205—234页。

⑦ 载《琉球新報》,1903年4月29日,《大阪朝日新聞》,1903年5月7日全文转载。

⑧ 载《時事新報》,1903年3月13日。

⑨ [日]田中芳男、平山成信編:《澳國博覧会参同記要》,森山春雍出版,1897年,第4—5页。

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官方印制图册里,卷首的文章所附的一张图描绘了主办方试图勾勒出的人类从黑暗的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进化”的阶梯。如图 2 所示,日本人被排在仅次于美欧、俄罗斯民族的第三位,被视为比中国人高 3 级,比阿伊努人高 7 级。值得一提的是,图片中的日本以女性形象出现,体现了东方主义的特点,然而其五官却酷似图画上手持“启蒙火炬”和“智慧之书”的寓言人物。<sup>①</sup>

图 2 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人类类型与发展图”<sup>②</sup>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前期,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同时,欧美人类学、民族学界也掀起了对世界各地“原住民”的人类学、民族学考察热潮;日本北海道岛的原住民阿伊努人,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sup>③</sup> 博览会上的阿伊努人自然引起了美国人类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 1904 年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会长弗朗西斯详细说明了参加博览会的阿伊努人,其中描述了他们的人种特征:“面部和身体特征符合高加索人的标准,肤色也类似于高加索人。”<sup>④</sup> 博览会的人类学馆主任麦基(W. J. McGee)、斯塔尔以及他们的助手们认为,阿伊努人是“日本帝国的原住民”,麦基确信他们“展示了并放大了日本进步背后的种族特征”,并相信:“(阿伊努人)在他们的职业和手工活中,展示了学生们所知道的工业发展中的某些最重要的阶段,其中一些物质艺术的萌芽以完美的状态呈现出来,将日本托举到世界发达国家之中。”<sup>⑤</sup>

阿伊努人在人类学馆里沐浴了西方人的好奇与迷惑的目光,他们自然地保持了他们在北海道的日常生产与生活状态,赢得了观者的尊重。有报道称:“阿伊努人因其具有低等文化的身体性特征而被人类学馆挑中,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原始、未开化,但他们是会场里最干净、最有礼貌、最具绅士风度和最为优雅的。”<sup>⑥</sup> 还有报道赞扬阿伊努人勤劳的品质:“阿伊努人在这里从事日常工作,比如雕刻软木、勺子和烟盒,并将其作为纪念品销售给观众。他们的销售库存永远不会积压,因

① Christ Carol Ann, “The Sole Guardians of the Art Inheritance of Asia: Japan at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8, no. 3, 2000, p. 689.

② 图片英文原称“Types and Development of Man”,出自 Buel, James W. (James William), “Louisiana and the Fair: an Exposition of the World, its People and their Achievements”, *Saint Louis*, 1904, vol. 5, p. 1.

③ 李文明:《20 世纪日本学界的“古代虾夷族群”论争》,载《世界历史》,2021 年第 4 期。

④ Francis David Rowland, *The Universal Exposition of 1904*,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Company, 1913, p. 526.

⑤ W. J. McGee, *Anthropology*, *World’s Fair Bulletin*, vol. 5, no. 4, 1904, p. 5.

⑥ Bennitt Mark, *History of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Universal Exposition Publishing Co., 1905, pp. 674 – 675.



为他们总是无法跟上订单。他们对工作的要求很高。”<sup>①</sup>

美国学界与民众对阿伊努人的认知并不符合日本通过参加博览会“发扬国威”、展现自身已经“文明开化”因而有资格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动机。事实上,有日本的人类学者对于阿伊努人的参展表示了消极态度,认为:“(人类学馆)把阿伊努人与我等日本人视为同一种族,实为疏忽。”<sup>②</sup>值得注意的是,北海道厅发行的护照附表户籍族称栏里,阿伊努人被标记为“北海道平民”,同行的美国白人斯塔尔等则被记录为“仆从”,宫武公夫指出,这种标记逆转了通常把“外国人”视为支配者和优越者的理解,并没有反映出白人、日本人、阿伊努人这种当时的人种等级,体现了阿伊努人与和人、美国人之间的柔性关系。<sup>③</sup>笔者认为,这恰恰是日本当局为了彰显日本已经成为“一等国”而刻意为之,同时也体现了对于将欧美白种人视为优越民族的观念的逆反心理。

日本与博览会主办方的人种认知差异还体现在圣路易斯奥运会的“人类学之日”(Anthropology's Day)活动中。1904年8月12至13日,博览会人类学馆展示的原住民当中的成年男子参加了前所未有的“人类学之日”赛事,其中包括四名阿伊努人。根据《世界博览会报告书》的记录,“该运动竞技……有博览会上的各部族的奇妙人群代表将会参加。这个傍晚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预计有巴塔哥尼亚、菲律宾人、阿伊努人等参加。同时也正在努力让日本人、中国人、东印度人、锡兰人和其他博览会代表参与进来”。<sup>④</sup>宫武指出,这份资料里让人饶有兴趣的是,该活动不仅适用于世界各地来参加人类学展示的被视为“未开化”的人种,还包含了日本人、中国人、东印度人和锡兰人这些“已文明化的”非西欧人;它被计划为整个非西方人的“人种竞技”;而不愿将阿伊努人等同于“和人”的“日本人”,是不可能参加这场人种竞技的,结果该竞技的参加者仅有被西欧人和“已文明化的”非西欧人划定为“未开化”的他者。<sup>⑤</sup>由此可见,20世纪初的日本人虽然期待与白人同等的地位,但在白人看来,无论是“和人”还是“阿伊努人”,都是亚洲的非白人、“他者”,是应当归属于同一领域的“原住民”<sup>⑥</sup>。而1906年发生的旧金山日本学童教育隔离事件<sup>⑦</sup>及其引发的美国排斥日本移民运动也警示了日本人:复杂而根深蒂固的“人种问题”是无法通过人种展示而解决的。

#### 四、“眼目之娱”背后阿伊努人所受到的“双重束缚”:日英博览会上的阿伊努人种展示

距离阿伊努人初次在世博会上亮相的七年之后,日英博览会(Japan-British Exhibition)上再度出现的阿伊努人种展示已经丧失了“眼目之教”的功能,没有人类学因素,淡化了阿伊努人与和人的肤色差异,沦为了观客的“眼目之娱”。而这次博览会也是日本最后一次在世界舞台上进行阿伊努人种展示。

日英博览会于1910年5月14日至10月29日在伦敦白城区举行。这是日本与欧洲国家首次

① “Japanese Indians”, *St. Louis Globe Democrat*, 1904.

② [日]柴田常惠:《セントルイ博覧會の人類學部》,载《東京人類学会雜誌》,1904年3月第19卷第216号,第240页。

③ [日]宫武公夫:《博覧會の記憶: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博覧會とアイヌ》,载《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紀要》,2006年2月第118号,第67页。

④ “OF SUPRASSING INTEREST Athletic Event to Take Place, August 16, at World's Fair”, *World's Fair Bulletin*, vol. 5, no. 10, 1904.

⑤ [日]宫武公夫:《人類學とオリンピック:アイヌと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オリンピック大会》,载《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紀要》,2006年12月第118号,第7页。

⑥ [日]宫武公夫:《人類學とオリンピック:アイヌと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オリンピック大会》,载《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紀要》,2006年12月第118号,第17页。

⑦ 1906年10月,美国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通过决议,禁止日本籍学生进入普通公立学校就读。这引发了日本民众的不满及日本政府的抗议,联邦干预未能促使旧金山撤销隔离,反而导致美国西海岸引起了广泛的排斥日本移民的运动。

联合举办的博览会,也是20世纪初叶西方世界有关日本最大型的活动。在两万余平方米的会场内,设有日本历史博物馆,展示中国台湾、韩国和“满洲”的东洋馆,日本政府和各行政机构展览馆等大型场馆,来自日本的展品超过五万四千件。

在博览会上,日本政府斥巨资精心筹备的历史馆、产业馆、艺术馆等特展的美术品和建筑模型颇受好评。相比之下,该博览会特设的“余兴”<sup>①</sup>区,迎来的几乎是一片骂声。该区的设置完全在于吸引游客、筹措运营资金,因而采取了一种“逆向东方主义”<sup>②</sup>的操作方法,完全委托英国民间演出业者辛迪加(syndicate)负责筹集五万英镑操办。在这个展示中,“任何有损日本尊严的事情都可以容忍”<sup>③</sup>。

日英博览会的阿伊努人种展示隐含了明治政府为其殖民正当性正名的意图,而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性表演。明治五年(1872年)实施“壬申户籍”后,日本本土原则上实现了土农工商的“四民平等”,仅分为皇族、华族与平民三个阶层。在户籍族称栏被标记为“旧土人”的阿伊努人与被标记为“新平民”的被歧视部落民是同样遭到蔑视的新阶层。然而,与此同时,作为“陛下之赤子”,他们也根据法律需要与“和人”同样承担各种国民义务。<sup>④</sup> 博览会有十名阿伊努人(六男四女)参加,还派出了一名专门的“阿伊努人管理者”。这些人的“旅行目的”栏与圣路易斯博览会时的“赴博览会”不同,被记述为“余兴出场”;在阿伊努人的附表中,“族称栏”与同行的“和人”不同,是空白的,这一栏本应当标明族属以及是否平民的信息,宫武指出,从以上把阿伊努人从和人中分离出来的记述方法里,可以看出行政上对阿伊努人的歧视。<sup>⑤</sup> 据宫武考证,日英博览会上的阿伊努参加者被日本的行政机构选为“模范性的日本人”,代表了近代阿伊努人社会当中的成功者,如支撑近代马政制度的“马产家”,还有曾经在日本陆军服役<sup>⑥</sup>的阿伊努男性贝泽贤治,以此象征着近代国家日本成功“文明化”的阿伊努人社会。<sup>⑦</sup> 该博览会举办期间的8月初,一名阿伊努婴儿诞生,这说明1910年4月中旬到达伦敦的阿伊努人当中,有一位女性在孕期经历了漫长的航海旅程;这说明活动策划方挑选原住民时采取了不人道的方针。<sup>⑧</sup>

在日英博览会中,日本政府显然将阿伊努人当作了大众文化中被消费的“落后”他者,并通过展示阿伊努人获利;与此同时,阿伊努人的选取策略又反映了日本政府“同化”阿伊努人的意图。宫武指出,这次博览会虽然仅仅在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六年后举办,但阿伊努人已经处于受到“双重束缚”(double bind)<sup>⑨</sup>的境遇,既作为“日本人”被同化,又作为与“和人”不同的他者而遭到排斥;其独特的文化和自我认识从原本的文脉中被割裂出来,被当作展品看待,与人们的交流与接触也受到了限制。<sup>⑩</sup> 换言之,博览会上被商品化的阿伊努人种展示也证明了其在日本社会同时面临的同

① 余兴即日文“余興”,是歌舞音乐等娱乐表演和景观设施的总称。

② 即“reverse-orientalism”,亦称自我东方主义化。日本将作为本国国民的阿伊努人他者化,意图通过展示其“原始”“野蛮”的一面而迎合英国观者对东方的猎奇心理,从而获取资金。

③ 《日英博览会事務局事務報告 下卷》,農商務省,1912年,第866—867页。

④ [日]海保嶺夫:《幕藩制国家と北海道》,三一書房,1978年,第332页。

⑤ [日]宮武公夫:《黄色い仮面のオイディプス:アイヌと日英博覧会》,载《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紀要》,2005年2月第115号,第34页。

⑥ 随着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国民皆兵”原则的确立,曾免于征兵的北海道于1898年将征兵对象扩大到全域,其中也包括阿伊努人,因而阿伊努人也参加过日俄战争。

⑦ [日]宮武公夫:《海を渡ったアイヌ 先住民展示と二つの博覧会》,岩波書店,2010年,第124页。

⑧ [日]宮武公夫:《海を渡ったアイヌ 先住民展示と二つの博覧会》,岩波書店,2010年,第142页。

⑨ 英国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的理论,指人同时获得相矛盾的两种立场的信息时所陷入的难以抉择、进退两难的状态。

⑩ [日]宮武公夫:《博覧会の記憶: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博覧会とアイヌ》,载《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紀要》,2006年2月第118号,第49页。

化与歧视。

与前两次博览会相比,日英博览会上的阿伊努人种展示既想要通过消费阿伊努人的“野蛮”“原始”而敛财,又意图强调日本对阿伊努人的“文明化”,这种矛盾的心态与做法对阿伊努人的展演和相关报道在逻辑上相当混乱,因而在英国和日本都受到了批评。将阿伊努人认作日本国民的知识界、政界人士纷纷为阿伊努人在日英博览会遭受到的不人道待遇发声。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年)愤怒地指出,“入场的日本人中但凡还存有少数大和魂的,都得流冷汗”,阿伊努人村里“有西洋人像到了动物园一般窥探小屋,引发了一些人道问题”。<sup>①</sup>在1911年1月24日的第27次帝国议会上,立宪国民党的藏原惟郭怒斥道:“将此我国同胞之土人,当作展品以收取参观费,这实在是人道上之巨大失态”<sup>②</sup>,他曾在英国观览博览会长达五个月时间。当时在英国留学、其后成为政治家的内崎作三郎则主张:“保护好阿伊努人种是日本国民对全世界人类负有的重大义务。促进阿伊努人种的发展是具有侠义之心的我国国民的光荣事业……在美国的黑奴中,有像布克·华盛顿<sup>③</sup>这样的伟人。如果施以适当的教育,阿伊努人之中没有理由不产生出相当的人物。我想请求国民注意到这一点。”<sup>④</sup>

### 五、指向“民族同化”:日英博览会之后的阿伊努人种展示

日英博览会后,阿伊努人种展示没有再次进入过世博会,但在日本国内的博览会上,阿伊努人种展示持续到了大正时代初期。例如,在大正元年(1912年)于东京上野公园举办的“拓殖博览会”,以及翌年于大阪召开的“明治拓殖博览会”等。在这类博览会上,纳入帝国版图的其他异民族也被纳入了展示中。

当时,日本的人类学界积极参与了博览会的设计和组织了。这类博览会被认为是“显示自然人类学者与博览会主办方蜜月关系的绝佳例子”<sup>⑤</sup>。东京人类学会第二十八届年会就在上野公园拓殖博览会观光馆内举行。坪井正五郎在会上首先开宗明义,表达了自己给天皇做以“日本版图内的人种”为题的“御前讲义”<sup>⑥</sup>时所感到的自豪,接着强调办会的宗旨是展示日本为多民族国家,并且认为向公众启蒙“日本境内”存在多种多样的民族是自己的责任。他指出,拓殖博览会是“能把帝国版图的诸人种聚集在一处”的“绝好机会”,于是他响应博览会干部要求,动员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sup>⑦</sup>的教员前往北海道等地出差进行“人种召集”<sup>⑧</sup>。

据在东京大学继承坪井职位的自然人类学者松浦瞭回忆,1914年东京大正博览会的南洋馆首先展示了“阿伊努人、朝鲜人、支那人”,然而他认为,“这三个群体是我帝国臣民”,作为“帝国版图内的异种族”常常有机会参与展出,因而与“吾等相亲”,导致其“珍稀程度减少”。<sup>⑨</sup>他重点关注的

① [日]长谷川如是闲:《日英博览会》,载朝日新闻记者编:《欧米遊覽記》,朝日新聞,1910年,第551—553页。

② 《藏原惟郭君ノ質問演説》,《第27回衆議院議事速記録第四号 明治44年1月24日》,载《官報 号外》,1911年1月25日,第10页。

③ 布克·华盛顿(Booker Taliaferro Washington, 1856—1915)是非裔美国政治家、教育家和作家。

④ [日]内ヶ崎作三郎:《英国より祖国へ》,北文館,1911年,第244—248页。

⑤ [日]山路勝彦:《近代日本の植民地博览会》,風響社,2008年,第53—54页。

⑥ 坪井正五郎在此文中使用的原词为日文里更为少用的“御前講”,指在家族身份、地位高贵者面前讲课。此处具体指他曾在东京帝国大学给明治天皇讲课一事。

⑦ 该教研室于1892年设教授职位,携学术资料参加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和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并获得奖状。

⑧ [日]坪井正五郎:《明治年代と日本版図内の人種》,载《人類学雑誌》,1914年1月第29卷第1号,第3页。

⑨ [日]松村瞭:《大正博覽會に於ける諸人種》,载《人類学雑誌》,1914年6月第29卷第6号,第233页。

是南洋馆里聚集的南洋群岛<sup>①</sup>及东南亚地区的孟加拉人、库林人、马来人、爪哇人、塞诺伊人共计二十五名,尤其是在博览会主办方分发的宣传册上被介绍为“食人族”的塞诺伊人。南洋馆安排了原住民与鳄鱼、大象、蛇混居,在展示其日常生活之余,还有“土人歌舞音曲演奏之余兴”。<sup>②</sup>

此次博览会正值20世纪10年代,也是有关日本人起源的“混合民族论”抬头之时。作为被认为最早经历了“混合融化”的民族,阿伊努人被树立为“文明化”的范例,即通过被和族同化而摆脱其“夷”的身份与遭受的歧视命运。近代史上的颇长一段时间,日本一直在单一民族论和“混合民族论”两者中摇摆、反复,国势比较弱小的时候就用单一民族论来自保,一旦变强大了,就用“混合民族论”来侵吞外部的东西。<sup>③</sup>一度将“日本人”定位为只能定居于小国、只能依靠排外和维持民族内团结来保持独立的劣等人<sup>④</sup>的井上哲次郎也已经转向了“混合民族论”。他受到文部省委托,为师范学校的修身科教员讲授“国民道德”,在其中引用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认为古代的“日本人原为杂种”“混合民族”,其中最为优秀的“天孙系统”同化了其他民族,因而“需要通过教育将帝国内的中国人、朝鲜人、阿伊努人等异民族均同化为日本民族”。<sup>⑤</sup>成立于1884年的日本人类学会也大致在同一时期开始讨论“日本民族”议题。他们主要依据体质人类学的分析和考古发现,围绕日本的民族构成展开讨论,例如阿伊努民族的起源以及是否有“文化先进的优秀种族”掺杂了“劣等种族的血液”<sup>⑥</sup>等问题。坪井则在一直在思考如何提升他的人种展示的科学性和普及性,他试图把各个国家、民族置于一个“文明—野蛮”的价值谱系之中,以此论证作为混合种族的“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并将这一观点自然延伸到日本作为“亚洲盟主”的对外扩张上。根据这种理论,由于日本列岛也有朝鲜血统,所以“日韩合并”被宣称为“复古”,“是饱经风霜的分家的兄弟回到温暖的老家”<sup>⑦</sup>。喜田贞吉在朝鲜演讲时说道,“先一步同化融合的人,哪怕是异民族,也将成为优秀的公民,而那些错过了同化融合时机的人将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最终成为后世贱民之源”<sup>⑧</sup>。相比于把先天与遗传视为决定因素的“人种”概念,“日本民族”论调更强调后天的可塑性,指向日本帝国内部凝聚力的强化。事实上,日本也曾把其对阿伊努人实施的强制同化教育经验应用到其对海外殖民地各个民族的“皇民化”政策手段上。<sup>⑨</sup>

## 六、结 语

综上,笔者认为,近代博览会上的阿伊努人种展示呈现了从拼接日本所描绘的“世界人种地图”到“日本帝国民族地图”的转变。尹健次曾提出了一个引发日本民族学界多年争议的问题:“为什么在明治初期在国民形成上起到重大作用的‘日本人种’表象其后消失了,变成了‘日本民族’‘大和民族’这两个几乎同义的表象?”<sup>⑩</sup>从本文分析的阿伊努人种展示问题看来,可以说,近代日本在两次世界博览会上展示的阿伊努人首先是通过彰显“和人”与阿伊努人之“异”,试图扭转日本人

① 又称南洋诸岛或内南洋,是西太平洋赤道附近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之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依照《凡尔赛和约》,赋予日本的委任统治地,包括现在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帕劳、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② [日]向上社编辑部编:《大正博览会と東京遊覧》,向上社,1914年,第53页。

③ [日]小熊英二著,文婧译:《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386页。

④ [日]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德概論》,三省堂,1912年,第6,49—51页。

⑤ [日]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德概論》,三省堂,1912年,第66,70,72—73页。

⑥ 如[日]小金井良精:《人類學上から見たる日本民族》,载《人類學雜誌》,1928年4月第43卷第4期,第160页等。

⑦ [日]喜田贞吉:《韓国の合併と国史》,三省堂,1910年,第64—77页。

⑧ [日]喜田贞吉:《庚申鮮滿旅行日誌》,载《民族と歴史》,1921年第6卷第1期,第44—45页。

⑨ 于逢春、李红阳:《“单一民族国家”神话视域下的日本近现代阿伊努族教育研究》,载《世界民族》,2020年第6期。

⑩ [日]尹健次:《民族幻想の蹉跎—日本人の自己像》,岩波書店,1994年,第26,38页。

自认为的身为黄种人的劣等地位,进行人种秩序的重构。正如约翰·L·轩尼诗(John L. Hennessey)所述,日本在西方博览会上展示其历史和传统文化并不是有意向西方的东方主义让步,而是试图表明一条通往现代性的替代道路是可能的<sup>①</sup>,但这一主张没有被英美接受。明治日本极力想获取的“东洋的希腊”<sup>②</sup>这一“优越”形象反而被赋予了人种上与欧美更为相似的阿伊努人。于是日本转而设法通过形塑作为“文明”的“混合民族”的“日本民族”,以破除“单一的西方文明”(the civilisation)。牧原宪夫指出,博览会是解决“文明开化”所包含的民众驯化等诸课题,将实现“文明国的国民兼天皇的臣民”培育的这一最终目标<sup>③</sup>变得更为轻易的场所。阿伊努民族被视为“文明化”的“优等生”,在被歧视的同时也被树立为“民族同化”的范例。后期日本国内的阿伊努人种展示也就成为日本企图构筑的“民族文明序列”的一部分,即以天皇为中心,以和人带动周边民族走向文明为必经之路的民族文明秩序。事实上,日本的殖民政策和宣传手段与欧美殖民者不同,强调本国民众与殖民者的“同”;自称是殖民地人民的手足兄弟,共享种族与文化根源,且同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sup>④</sup>可以说,这种民族景观在承袭江户时代以降的日本式“华夷秩序”所包含的同化与歧视观念及政策的同时,依托日本的近代化、工业化成果,通过将“文野之别”与“民族”而非肤色的差异相挂钩,消解了近代日本的人种焦虑,构建了身份认同,为侵略与殖民统治“正名”,指向对二战前以欧美为中心的人种政治乃至文明秩序的跃迁。

**Abstract** The exhibition of a race at modern world's expositions once used social Darwinism as a theoretical basis to select, classify and display the bodies and cultures of peoples labeled as “barbaric” and “primitive” in order to link “civilization” with the superiority of the white race.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which was committed to “civilization enlightenment”,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the Western “human zoo” to display human beings. By displaying the aboriginal Ainu people of Hokkaido, whos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close to those of the white race, at the World Expo, Japan tried to demonstrat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Yamato” as the yellow race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ir civilization. After this display, which was intended to bring the “Yamato” to the top of the “ethnic hierarchy”, was rejected by the West, Japan gradually turned the stage display of the Ainu to the domestic, and juxtaposed it with other colonial indigenous peoples at the time, to justify Japan's policy of “ethnic assimilation” in Asia. This change of strategy highlighted the attempt of modern Japan to construct a discourse system, in which the “Japanese nation” was the leader of the East Asian alliance, to talk with the white race on an equal footing, thus leapfrogging into the ethnopolitical and even civilization order centered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周菲菲,研究员,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日文系,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黄凌翹]

① John L. Hennessey, “Moving up in the world: Japan's manipulation of colonial imagery at the 1910 Japan – British Exhibition”, *Museum History Journal*, vol. 11, no. 1, 2018, pp. 24 – 41.

② [日]吉見俊哉:《博覧会の政治学:まなざしの近代》,中央公論社,1992年,第212页。

③ [日]牧原憲夫:《文明開化論》,载朝尾直弘等編:《岩波講座 日本通史 第十六卷 近代I》,岩波書店,1994年,第252页。

④ [日]南希·K.斯托克著,张容译:《神奈川冲浪外:从传统文化到酷日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20页。